

回望中共百年侨务工作

新中国便利侨汇政策的提出与作用

张小欣

侨汇是海外华侨汇回国内用于赡养家眷等款项的简称，其本质是非贸易外汇。因涉及国际金融和国际邮政业务，侨汇也成为连结海外侨居地和国内侨乡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并且在平衡中国国际收支、增加国家外汇储备、提升国家金融和外贸经营能力、连通中外邮递寄递、促进侨乡生产发展、改善侨眷家庭生活等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是我国侨乡经济社会文化面貌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保障。

党和国家历来重视对华侨汇款的保护。在解放战争即将全面胜利之际，1949年6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部在上海公布《外汇管理暂行办法》，第一条就谈到，制定该办法之原因系“为推进国际贸易，便利侨汇，平衡国际

收支，防止投机，繁荣经济”。便利侨汇作为侨务政策的一项重要原则，也被写入同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明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尽力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对于华侨汇款应采取“便利侨汇”的政策。这是新中国首次以文字形式正式提出国家对侨汇的管理原则。“便利侨汇”原则的确定，鼓励和支持在国家政策规范和指导下，能够促进侨汇寄递、维护侨眷利益的政策，除中央政府和各省级政府外，各级中国银行和侨务委员会也成为侨汇政策的主要制定、贯彻和执行者。在中央政策规范下，各地侨汇处理办法先后出

台。1949年12月，广州市军管会颁布了《华南区侨批业管理暂行办法》、《侨汇优待暂行办法》及《华南区外汇管理暂行办法》等，鼓励各类侨汇业在中国银行的领导下展开经营，并对侨汇兑换施行优待侨汇牌价，鼓励将侨汇转为原币存款、折实存款或侨汇原币存单等。1950年1月，福建省人民政府颁布《福建省侨汇暂行处理办法》，规定中国银行等国有金融机构必须对侨汇寄递实施便利和优惠，对侨汇私营机构的侨汇运营予以配合、照顾和规范，协助侨胞自备外汇进口等。1951年，政务院颁布《侨汇业管理暂行办法》，鼓励侨汇业利用在海外长期经营积累的经验和运营网络，打破外在封锁，以多种形式揽收侨汇。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银行在伦敦、新加坡、吉隆坡、檳榔屿、雅加达、加尔各答、孟买、卡拉奇、吉大港、仰光和香港等11个城市和地区设立分支机构，以方便侨胞汇款。同时，国家鼓励侨胞通过侨批局办理汇款，对侨批局及相关从业人员采取了“加以团结鼓励，发挥积极作用”的政策。为进一步扩大对侨汇管理政策的宣传，1950年4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营业部的《侨汇问答》，就国外侨胞对国内汇款应该怎样办理、汇款的方法怎样、要收多少手续费、原币汇款汇到国内如何折算付给、假使收款地点没有上述银行又该怎么办等5个问题作出了回答，方便读者特别是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

了解最新的侨汇管理政策。

在国家“便利侨汇”政策的支持下，1950年，全国侨汇收入约达1.05亿美元，其中仅广东粤中区的侨汇就有3000万美元，等于该区农业收入的总值。1951年，全国侨汇收入增至约1.86亿美元，有效了解放前夕侨汇往往流入黑市而不进入国家银行的侨汇逃避问题。据1952年中国银行统计数据，全国侨汇总收入中的小笔赡家费占侨汇用途总数的97.73%，而储蓄、投资等用途所占份额极小，可见新中国成立初期，侨汇问题是关系广大侨眷和国家外汇收支的大问题，对主要侨乡大省的经济繁荣与侨眷生活维系更有着决定性影响。为进一步巩固“便利侨汇”政策，周恩来总理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最有影响力的一项侨汇政策，进一步肯定了侨汇是侨胞、侨眷的正当权益之一，要求各级地方国家行政机关在对侨汇资金的使用方面应给予便利，得到海外侨胞和国内侨眷的广泛拥护和认可。

（作者系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研究员）

百年航程 有“侨”精彩⑬



马寅初

经济学家马寅初——

『国难当头，我绝不离开』

张秀明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马寅初曾以专家的身份对中国战时经济进行考察，他看到的是国民党军政要员贪污腐败、巧取豪夺、纸醉金迷，全然不顾老百姓和前方战士的死活，他将这种情况精辟而形象地概括为“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这一说法不脛而走，让蒋介石非常难堪。于是，有人奉命前来劝说马寅初，只要马寅初听话，可以安排他住好的房子，可以去美国考察，时间长短和经费都不是问题。如果他购买黄金，只要说一个数字，可以立即照办。马寅初听后更加反感，立即公开发表了“严正声明”：“一、在此国难当头，我绝不离开重庆去美国考察；二、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我要保持说话的自由，国民党政府的立法院没有多大意思，我绝不去北碚居住，并要逐渐同立法院脱离关系；三、不搞投机生意，不买一两黄金、一元美钞。有人想要封住我的嘴，不让我说话，这办不到！”

马寅初不断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现象，蒋介石在无可奈何之下，想用委任马寅初做高官的办法来说服他。蒋介石提出三个职务让马寅初挑选：中央银行总裁、财政部长、全国禁烟总监。这三个官职在当时可是肥缺，国民党的党政要员都垂涎三尺。但是，马寅初丝毫不为所动。没办法，蒋介石想亲自出马说服马寅初，就让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去请马寅初来见他。蒋介石对叶元龙说：“我要当面同他谈谈，他是长辈，又是同乡，总要以大局为重！”

叶元龙深知马寅初的脾气和骨气，知道会碰钉子，但蒋介石的命令又不能不执行，只好让侄子向马寅初转达。马寅初听后说：“委员长是军事长官，我是个文职，文职不去拜见军方！再说从前我给他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应当来看老师，哪有老师去看学生的道理！他如果有话说，叫他来看我！”

蒋介石非常尴尬和生气，但也不好发作，只好对复命的叶元龙说：“我是想同他谈谈经济问题。你回去告诉他，以后有时间，随时可以来找我。”但是，马寅初却不把别人引以为荣的单独见面蒋介石的机会当回事，始终不去见蒋介石。

马寅初毕生从事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他曾任北京大学校长，也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人口学家，是中国研究西方经济学的先驱之一。20世纪20年代，马寅初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经济学的各种流派。新中国成立后，马寅初将研究重心转到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理论上，学术成果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在教育方面，他一直重视教学，在课程内容改革、师资培训等方面都作出了有益尝试。同时，马寅初也十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强调办教育要“学习新思想，确立为人民服务的立场”。

马寅初一生热爱祖国、坚持真理、追求进步，为新中国不懈奋斗、献计献策。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侨胞说·祖国在我心中⑬

德国归侨、东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王志功——

用爱国心打造“中国芯”

本报记者 林子涵

60平方米空房间，搭建集成电路实验室

从德国回到母校东南大学，我立即着手筹建射频与光电集成电路研究所（以下简称射光所）。那时，中国的集成电路设计、芯片制造和测试等领域与美国、德国相比至少落后20年。在产业方面，自主生产的集成电路只能满足不到20%的国内市场需求，关键集成电路如计算机核心芯片CPU、光纤通信系统高速电路、互联网网关卡电路等几乎100%从国外进口。对中国信息安全网络而言，这无疑隐藏着巨大威胁。在研究方面，集成电路高技术人才奇缺，研究条件与外国实验室相比天差地别，相关研究也需快马加鞭、迎头赶上。因此，我在回国前就打定主意，要把多年积累的射频、超高速、光电集成电路研究经验，尽快应用于国内高端集成电路事业。

在国内建设集成电路实验室，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射光所初创时，只有一间60平方米的空房间、100万元启动资金、1名研究助手和2名新招收的硕士研究生。集成电路设计必备的软件工具、集成电路制造测试装置和仪器、实验室服务器、工作站、计算机和网络环境等都需要从头搭建。

条件朴素更要迎难而上。为了高效配置实验室软硬件环境，我和众多国外供应商展开谈判，反复分析、比较各家报价，希望以最优惠的价格为射光所争取最好的条件。当时的一套电路分析软件，外国供应商的要价每套约1万美元。经过与多家公司的上百次传真和邮件沟通，最后我成功以7000美元引进12套软件，帮射光所打好基础设施建设第一步。

一张芯片的诞生，必须经过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封装、测试等环节。上世纪90年代，国内仅有的几条集成电路制造工艺线不具备代工条件，需要开拓国外的代工制造服务。于是，我带领射光所开辟当时国外普遍实践、国内却尚不熟悉“无生产线集成电路设计+代工制造”模式，与美国、法国、德国、奥地利等国家的13家20多条工艺线签订合作协议，以多项目晶圆模式委托制造集成电路。为了获取德国IHP世界最高速锗硅BiCMOS工艺，我专程前往位于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进行谈判；为了获取法国CMP的MEMS工艺和OMMIC公司的GaAs工艺，我两次飞往法国签订流片（芯片流水制作）服务协议。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是我的座右铭。面对从零开始的实验条件，我明白，这是回国科研创业的必经过程。只要跨越这个难关，我们的集成电路研究一定会迎来质变。

芝麻大的小芯片，蕴含光纤通信加速器

1998年，射光所通过美国MOSIS大学计划服务平台与台积电达成了流片服务协议。但在利用台积电的0.35微米CMOS工艺设计2.5Gb/s（千兆比特每秒）光纤通信用超高速集成电路时，射光所还无法获得芯片设计与版图设计的全套文件。于是，我带领全研究所师生奋战一个暑假，边学习、边设计，基于已经得到的设计软件平台，开发了台积电0.35微米CMOS工艺模拟电路设计套件，于1999年8月完成了第一批数千超高速芯片的设计，提交台积电流片。这是射光所无生产线集成电路设计平台的第一次运行尝试。

3个月后，制成的光纤通信用限幅放大芯片运抵上海虹桥机场。但新问题又出现了：由于这是一种全新的进口物品，海关找不到相应的报关规范。为此，我专程赶到虹桥机场，向海关解释这些芝麻大的芯片来龙去脉。经过一番周折，终于把我国第一批以无生产线设计和多项目晶圆境外制造模式获得的芯片拿到了手上。

握着芯片，我的手颤抖不已。一方面，回国奋斗终于有了成果，我忍不住心潮澎湃；另一方面，我也担心制成的芯片能否测出结果。我在德国研究期间，实验室采用的是双极性晶体管工艺和砷化镓工艺，两种工艺都有完善的设计、制造和测试环境，有上百人的高水平研究团队进行合作。而此次的设计环境、工艺类型、流片渠道和地点都是全新尝试，芯片是否制作成功尚属未知。

令人激动的是，回到射光所后，芯片一举测试成功，各项指标满足设计目标。2000年4月，我组织的首届中德光电子器件与电路专家论坛上，国家“863”计划光电子主题专家组现场评定后一致认为：光纤通信用限幅放大芯片研制成功，填补了国内空白，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在2000年的中德光电子器件与电路专家论坛上，与会的德方专家特别是一直关注着我回国工作进展的德国鲁尔大学教授，对射光所用如此短的时间、花如此少的经费、取得如此高水平的研究结果表示钦佩。

2003年，射光所利用0.2微米砷化镓工艺，开发一种光纤通信用激光驱动器芯片，测试达到24Gb/s的工作速率，创造了当时最高速“中国芯”。此后10余年，射光所开展上百批、上千种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和测试工作，承担一系列国家级、省部级和企业合作项目。如今，我们采用CMOS工艺成功开发的S波段变频收发芯片已应用于多个国家重大装备，应用总量超100万颗，产生经济效益上亿元。

披荆斩棘，成功设计多批国际先进水平的超高速集成电路，推动芯片国产化再进一步。

回国创“芯”24年，王志功说这是他一生无悔的选择。今后，为了中国射频、超高速与光电集成电路设计人才的培养，他还将继续前行。

以下是他的自述。



王志功(左二)正在指导研究生。受访者供图

24年创“芯”史，建设人才培养新高地

回国24年来，我见证了中国集成电路设计和芯片制造业从弱小到强大、集成电路设计人才从数千人到超过10万人、集成电路设计企业从屈指可数到上千家、工艺线从几条到近百条的发展历程。我衷心为自己参与中国科技巨变而感到自豪。回国科研创“芯”固然历经困难，但现在回头看，我仍然要说一句“今生无悔”。我从一个农民的儿子成长为国家高技术领域的专家，离不开祖国的哺育和支持。把掌握的知识和技术奉献给祖国，就是我的初心和理想。回国以来，我先后获评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江苏省“劳动模范”、首届“全国侨界十杰”称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些荣誉就是对我继续前行的鼓励。

当前，我国集成电路芯片特别是核心芯片设计制造水平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相比仍有不小差距。想要制造成千上万颗“中国芯”，难点在于如何培养更多高水平集成电路人才、攻克纳米工艺芯片尖端制造技术、破解高端芯片“卡脖子”难题。我坚信，一名优秀的芯片领域研究者，不仅要具备宽广深厚的材料、工艺、器件、电路、系统和设计工具知识，还要有勇于创新、勇攀高峰的闯劲和耐得住寂寞、不求速成的工程师精神。这既是我对自己的要求，也贯穿我对研究生的培养过程始终。至今，射光所已培养10多位博士后、100多位博士、1000多名硕士，其中30多位成长为大学集成电路设计相关学院的教授和副教授，数十位成为国内集成电路设计领域的领军人物。3000多名国内集成电路设计工程师也在这里接受培训。下一步，我将继续推进射频、超高速与光电集成电路设计人才培养工作，为中国芯片领域输送优质人才，为打造“中国芯”作出新贡献。